

周恩来

1898—19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

1898—1976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编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4
(红色经典·领袖传记丛书)
ISBN 978-7-220-07792-0

I. 周… II. 中… III. 周恩来 (1898~1976)
—传记—画册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825 号

红色经典·领袖传记丛书

ZHOUENLAI

周恩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 编著

责任编辑	陈小梅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杨潮
责任校对	叶勇
责任印制	祝健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2mm
印 张	8.5
插 页	1
字 数	191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792-0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序言
前言
自序
后记

第一部分（一八九八——一九二七）	1
童年	1
从淮安到东北	3
在南开学校	5
东渡日本	8
在五四运动中	10
旅欧入党	14
在黄埔军校	16
结婚	18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21
第二部分（一九二七——一九四五）	23
领导南昌起义	23
出席中共六大	25
坚持白区斗争	26
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29
在遵义会议上	30
与张学良、蒋、宋、孔会晤	33

调停西安事变	35
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36
开辟国际统一战线	38
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40
云岭之行	42
在莫斯科	44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47
书写红岩春秋	48
出席中共七大	50
第三部分（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54
重庆谈判	54
领导蒋管区民主运动	57
转战陕北	59
协助毛泽东指挥大决战	63
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65
迎接宋庆龄北上	67
主持和平谈判	70
筹组新政协	73
第四部分（一九四九——一九五六）	77
筹建政务院	77
主持对外建交	79
稳定经济形势	82
领导救灾治水	84
出访莫斯科	88

参与决策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90
参与领导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95
为航空事业奠基	98
主持编制“一五”计划	101
声明总有一天我们要收回香港	103
关怀班禅大师	106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09
出席日内瓦会议	111
描绘“四化”蓝图	116
筹划发展原子能事业	118
参加亚非会议	121
争取钱学森回国	124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	126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129
第五部分（一九五六——一九六六）	133
主持制定和实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133
创造民族团结合作的范例	136
介绍程砚秋入党	139
协助毛泽东指挥炮击金门	142
接见特赦战犯	145
提出“八字方针”	149
解决粮食问题	151
到邯郸调查	154
夜访新侨饭店	156
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	159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62
三到大庆	165
主持中法建交谈判	168
担任《东方红》的“总导演”	170
宣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73
在邢台地震的日子里	176
第六部分（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179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179
亲拟特殊的保护名单	182
保护部长们的“避难所”	185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188
在工交座谈会前后	191
维护交通大动脉	194
支持“二月抗争”	197
顶住“揪陈”和外交部“夺权”恶浪	200
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	203
面对庐山风云	206
推动“乒乓外交”	209
处理林彪事件	211
领导批判极左思潮	215
批准“四三”引进方案	218
接待尼克松总统	221
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	224
“解放”老干部	229
促成邓小平复出	232

与毛泽东长沙决策	235
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	237
支持邓小平整顿	241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244
人民的怀念	249
附 录	254
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	254
后 记	262

第一部分

(一八九八——一九二七)

童 年

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城内驸马巷家中。

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农历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城内的驸马巷。幼名大鸾。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曾任“江宁布仓大使”（即管公仓的财政官），后到淮安当师爷，并定居于淮安。在周起魁的晚年，他谋得了淮安府山阳县候补知县的职位，但因原任知县迟迟不肯离职，他始终只是“候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0多岁的周起魁去世。由于他生前不事生产，因此死后的家产除了那所大房子外，就剩城外的几分坟地了。这时，周家已经日渐衰败。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老大贻赓（字曼青）、老二贻能（后改名劭刚，字懋臣，即周恩来的父亲）、老三贻奎（字焕臣）、老四贻淦（字簪臣）。周恩来的生父常年在外谋事，收入微薄，仅够维持家用，这使周恩来从小便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是淮安府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万氏生有三子，长子恩来，次子恩溥，三子恩寿。她读过几年私塾，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周恩来不满半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周贻淦膝下无子女，为了安慰他，也使他的妻子陈氏能有所依靠，周恩来被过继给病重的叔父。可是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周贻淦的病带来转机，两个月后，叔父去世，幼年的周恩来便由嗣母陈氏抚养。周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嗣母为“娘”。陈氏出生于宝应县城一户比较贫寒的人家，父亲是清朝的秀才，还学过一点医术。在这样的家庭中，陈氏自幼喜欢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文学修养，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才女。她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因为年轻守寡，她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

抚养和教育上。

周恩来4岁时，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时，进家塾读书，正式取学名恩来，字翔宇。此后几年内，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并且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红楼梦》和《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典籍，他虽然不能全部读懂，但对他却是最早的熏陶。嗣母对他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在窗前教他读书。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后来，他曾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到清河县清江浦居住，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中读书。万家藏书很多，使周恩来能大量地自由阅读。后来他还到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龚荫荪是革新派人物，结识同盟会成员，赞助革命，常向周恩来介绍新思想和时事政治知识，使周恩来开始接受政治上的启蒙。

从淮安到东北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

1907年春天，周恩来9岁时，生母万氏病故。生母去世，给他打击很大。第二年7月，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家中料理完两次丧事，已是债台高筑，不得不靠典当借债度日，这使周恩来从小懂得了生活的艰难。其后不久，周贻能经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周恩来则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

在淮安老家居住时期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当时，周恩来只有10岁。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收入都很微薄，叔父周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男人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担当起持家的重任。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佐理家务，井然有序”。

1910年，周恩来12岁时，其伯父周贻赓在奉天（今沈阳。——编者注）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编者注）俸饷科已升任科员，生活比较安定。周恩来平时同伯父常有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和伯父商量。伯父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这个聪明好学的侄儿，也很同情他的处境。于是他托在东北做事的堂弟周贻谦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带信给周恩来要他到东北来，跟随自己生活。周恩来看过伯父的信后，作出了去东北的决定。

1910年春天，周恩来随周贻谦到东北。离开了淮安，他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周恩来始终对淮安怀有美好的回忆，那里是他生母和养母的长眠之地。由于奉天府一时没有适合的学校可读，所以周恩来先寄居在铁岭三堂伯家，进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当年秋天，伯父将他接到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念了两年书。这所学校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校，既教中国的

经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在小学第二学年，周恩来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扬。1913年奉天一家出版社和1915年上海一家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都收了这篇作文。

1911年暑假，周恩来随同学何履祯到奉天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何家做客。何履祯的祖父何殿甲带他们去凭吊附近的一个古战场龙烟山。这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那是一场要争夺东北三省的战争。仗就在中国土地上打，人民遭难，可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但不去抵抗外国侵略者，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划为“战区”。了解了这段屈辱的历史，周恩来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从此他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有的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账。”周恩来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

在南开学校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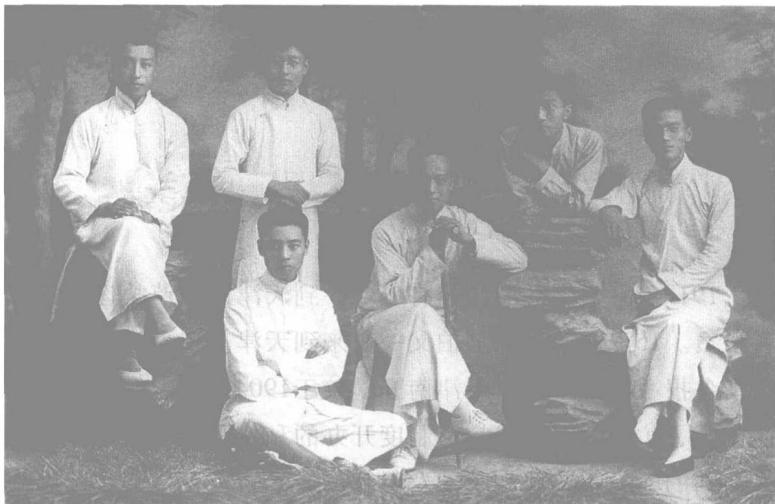
——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

1913年春，周贻庚工作有变动，到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15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来到天津。到天津后，他立即准备报考南开学校。天津南开学校于1904年创建，是一所闻名全国、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创立人是做过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和学部左侍郎的严修，校长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教育家张伯苓。该校学术空气浓厚，教学作风民主，

并以管理严格而著称。1913年8月16日，周恩来参加南开学校入学考试，被录取后，于8月19日报到入学，编在一年级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度过了从15岁到19岁的中学时代。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当时天津每年举行一次全市中等学校学生演讲比赛，周恩来曾两次被推为学校的三名代表之一，而在这两次南开学校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他还担任了学校演说会的副会长。1916年5月间，学校里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周恩来所选题目是《诚能动物论》，这篇作文得到了全体国文教师的一致好评，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评为全校第一名。

1914年3月，周恩来与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取名为“敬业乐群会”，表示“敬重学业，



周恩来（前排左一）同南开学校老师仇乃如（前排左二）等合影。

联络感情之意”。会内分为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自己办起图书室，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行等活动。“敬业乐群会”会员起初有20多人，后来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虽然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他却积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自己担任智育部部长，还担任过稽古部部长。1915年9月周恩来当选为副会长，之后又当选为会长。

在“敬业乐群会”的活动中，周恩来负责主编会刊《敬业》。《敬业》为半年刊，每年3月和6月出版，自1914年10月创刊，先后出版了6期。内容主要刊登会员的时政评论、学习心得和会内活动。在周恩来的主编下，这份刊物办得生动活泼，文字清新，内容丰富。在《敬业》会刊上，周恩来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评论、小说、杂感。1916年9月，周恩来担任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经理部总经理，负责刊物的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宜。

在南开学校就读期间，周恩来还担任了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他多次参加演出，并在南开学校成立11周年的纪念会上演出新剧《一元钱》。那时，社会风气没有大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就由周恩来扮演。在校期间，周恩来先后参加《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十多个新剧的编导和演出。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在南开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

东渡日本

大江歌罢掉头东， 遂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决定到日本留学。靠同学、师友的帮助，他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0月，周恩来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深知来日本求学之不易，为自己制定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还尽力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和了解。

1918年初，由于考期渐近，日语进展不大，再加上接到堂弟来信得知在家久病的叔父周贻奎已去世，周恩来异常悲痛，情绪低落，曾一度考虑过是否能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痛苦。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以便了解他们的国情。这年春节，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本年做事应遵循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

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经过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周恩来逐渐改变了以往认为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能够拯救中国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在20世纪的进化潮流中如不实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

周恩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因日文成绩不好，未被录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4月3日，他在给南开同学冯文潜的信中提出：“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此后，周恩来改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但还是因日文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

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周恩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周恩来就看过《新青年》，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一下，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从天津动身赴日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在赴日途中阅读，甚是喜欢。到东京后，他又从在日本留学的严修的儿子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3卷的全份，看后颇受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使周恩来树立了新的信念。在《新青年》的巨大影响下，周恩来的思想得到了升华。

1918年5月，周恩来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该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入会后的周恩来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和新中学会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和不同